

抗

国共第二次合作秘闻录

KANG RI

GUO GONG DI ER CI HE ZUO MI WEN LU

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抗

国共第二次合作秘闻录

柳建伟 / 著

KANG RI
GUO GONG DI ER CI HE ZUO MI WEN L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秘闻录/柳建伟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653-6

I. 抗... II. 柳...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649 号

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秘闻录

著 者:柳建伟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电传: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653-6/I·186

定 价: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蒋介石春风得意,三管齐下寻找共产党●东征受阻,共产党打通密谈渠道●日本国尚处“小康”阶段,不想扩大战争●好事多磨,十几轮密谈,只谈出一则犹如鸡肋的“参考消息”●蒋介石:军队保留三千,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毛泽东:决意以战争求和平,政治解决国共冲突遂成弃儿。

第二章 (027)

●处境险恶,毛泽东作背水战,写信策反孙科、冯玉祥●丙子“双十二”,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张学良为共产党让出延安城●委员长因祸得福,肢解东北、西北军●西安初谈判,蒋介石咄咄逼人●兵败祁连山,毛泽东以进为退●杭州谈判,周恩来走“夫人路线”●舌战牯岭,合作近在咫尺梦难圆。

第三章 (057)

●卢沟桥事变,战与和,蒋介石仍举棋不定,国共合作再拖延●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失去自信;国共两党看战争,一悲一喜●洛川会议,毛泽东远见卓识倡自主、夺权●华北、淞沪战局恶化,国共合作终于形成●“钦差大臣”王明回国摘桃子,共产党内部起纷争。

第四章 (075)

●温情脉脉的乐章:国民党推出和平吞并共产党的庞大计划,共产党不屈不挠守独立●党内派系纷杂,国民党出



Xiang Pi

现信仰危机●季米特洛夫劝王明退出竞争，共产党内部渐至佳境●张国焘叛逃，毛泽东喜大于忧●汪精卫“红杏出墙”，蒋介石吞咽苦果●两个大党的谈判成泡影。委员长名言：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第五章 (104)

●平江惨案，国共摩擦重现●二战爆发，蒋介石喜出望外，明令限共防共●晋西北事变，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毛泽东构想大战略，白崇禧献出新对策●河北三次摩擦，国军损兵两万●国民党惊呼：共产党三年时间已拥兵五十万，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再过一两年肯定不止一百万，那时哪还有我们的活路●军事谈判，双方都在拖延。

第六章 (129)

●德意日、英美苏两大集团都看好中国，蒋介石自觉左右逢源。黄桥一战，陈毅初露外交家锋芒，委员长痛下消灭新四军决心●何白“皓电”，国民党下“哀的美敦书”，中共准备好应付最黑暗局面●圣诞之夜，蒋介石给周恩来灌“迷魂汤”；生日这天，毛泽东帮项英“料理后事”●主将不和，江南新四军罹难奇冤。

第七章 (155)

●罗斯福初涉中国内政，蒋总裁手忙脚乱应付●参政会国共两斗法，各胜一局●兄弟阋于墙，日军攻占中条山●苏德开战，国共关系有转机●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毛泽东潜心整理“内务”●开国大业，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对日宣战，蒋介石行走大国政治舞台●毛泽东在延安为二战卜命运，十卜九准。

第八章 (175)

●林彪病愈回国，蒋先生“秋波”频频●师兄会师弟，胡宗南问内战前景，林彪曰：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最困难的1942年，日军重弹速胜论●阎锡山与日“和谈”，蒋介石

石欲同毛泽东面谈,国共日三角关系十分微妙●林师长千里追校长,大元帅先冷后热待学生●领袖的直感——扑朔迷离政治交响曲的华彩乐章。

第九章 (203)

英、美、日外交大战,中国意外结束二等国家历史,蒋总裁著书庆祝●共产国际解散,吹皱中国一湖浑水●委员长重弹老调:共产党应放弃政权和军队,然后加入国民党●内战迫在眉睫,胡宗南拟定九路闪击延安计划,毛泽东处惊不乱●一场空前绝后宣传战,陈伯达一夜成名,委员长文名扫地●毛泽东完成党内统一大业,蒋先生开罗露怯。

第十章 (229)

●“山姆大叔”准备放弃蒋介石,目光开始投向延安●辛辛苦苦谈七年,一夜回到抗战前,国共所提条件南辕北辙●委员长亲施反间计,阻止美国亲近共产党●毛泽东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黎明前的黑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罗斯福逼蒋交军权。国民政府摇摇欲坠。

第十一章 (258)

●美国介入国共谈判,双方都在争夺赫尔利,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赫大使纳闷: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心里赞成什么,口里却说不得●神奇的中国文化,神秘的东方政治●毛泽东、周恩来想去美国见罗斯福●赫尔利玩西方阴谋,美国政府选择蒋介石。

第十二章 (292)

●日本国战败投降,国共双方面临与与分选择●缓兵计,蒋介石三请毛泽东;将计就计毛泽东显弥天大勇●重庆谈判,三十个决定胜败的饭局。二龙同榻林园官邸,神秘的政权移交仪式●梁漱溟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改朝换代,结束二日同空历史,台湾海峡,留给国共关系一个



Xiang Pi

悬念。

结 语 (310)

主要参考书目 (313)

第一章

●蒋介石春风得意，三管齐下寻找共产党●东征受阻，共产党打通密谈渠道●日本国尚处“小康”阶段，不想扩大战争●好事多磨，十几轮密谈，只谈出一则犹如鸡肋的“参考消息”●蒋介石：军队保留三千，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毛泽东：决意以战争求和平，政治解决国共冲突遂成弃儿。

1

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异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了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

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蒋介石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作这种评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四·一二”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评判，存在着误读迷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的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曾对臭名昭著的《塘沽



Kuang Pi

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行辩护，称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尚感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作孤注一掷，以求一时平抑国人之愤怒，正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 1935 年发生在中国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蒋介石心里。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是苦水。必须指出，蒋介石能获得 1935 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孙中山仙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作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样子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侮”问题了。

在 1935 年秋天的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异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

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作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

11 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蒋介石表明如下两个希望：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的统一，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三鸟。综观蒋介石的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敏

感,直到十五年后他到台湾小岛偏安,他才认真考虑了这种操作的得与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才能太职业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于他无法获得百发百中的成绩。1927年夏天,他被桂系所逼,通电下野,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弄明白了“关系”,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这年9月,他重游青年时求学的去处日本国,开始尝试这种办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太对他和宋家三小姐美龄的婚事的默许;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助他统一中国的承诺。

然而,这一次苏联对他送去的秋波却视而不见。大约过了五天,鲍格莫洛夫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只是个松散的组织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历史没有留下蒋介石得到这个结果时的任何直接反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国与国间等价交换关系的真理性。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很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脸色。这似乎不能算作蒋介石个人的局限。或许蒋介石认为苏联没有回报他的秋波,只是觉得他这一头砝码太轻罢了。只能这么推测。因为翻遍全世界的史书,找不出任何无私的、纯粹的援助,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利用的泼墨画卷,特别在这种战争纷纭的非常时期。或许在和平成为主旋律的时期,国家与国家间会发生纯洁得叫人心疼的友谊,比如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奉送受到自然灾害时的慰问品。这一次接触,无论是苏联还是蒋介石,都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视作道德规范的高尚动机。

但是,如果把这个插曲视作蒋介石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中止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认为,太低估了蒋介石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反对派了,用什么办法使它臣服,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文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对照四个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抗日宣言,蒋介石发现中共也要改变政策



Kang Ri

了。

《蒋总统秘录》一书里，没有记载蒋介石对“抗日反蒋”口号的感受，事实证明蒋介石没有过细地注意王明讲话的用词。圣诞节后，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

因邓文仪官职卑微，蒋介石不可能与他谈天说地，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领了旨意告辞，在客厅门口又被蒋介石叫住了。蒋介石把玩着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语。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终于，蒋介石站了起来，却仍没说话，背着手踱了一会儿，背着邓文仪说道：“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八十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人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八十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元旦，蒋介石见到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个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

我们不应忘记蒋先生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否则……

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在 1935 年底面临的现实吧。

一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惨淡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向比较偏远的、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转移。经过

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第一方面军所剩不足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入刘志丹等人开辟的陕北根据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已对红军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共产党和红军仍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率部南下后,红军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确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针。“北上抗日”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眼下只能通过弯弯曲径才能逼近它们了。

12月1日,毛泽东复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路线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的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利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与外蒙靠近。”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总参议杜斌丞,策动十七路军反蒋抗日,并希望杨、杜二人谅解红军前一段歼沈克师一个团的事情。

同是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联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

从这些电文和信函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步履维艰的困窘。靠近外蒙,是为了在危难的时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万一在蒙古兵败,尚可学马占山进入苏联,以备东山再起。推迟时间,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难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选择走山西和绥远,是为了争得民心,因为谁都知道,宁夏那时并没有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走山西、绥远,可以高扬抗日的大旗,出师有名。和正在与自己交战的西北军、东北军联系,是为了利用敌阵营内部的矛盾,寻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张国焘的电文如雪后之霜,真正把毛泽东、张闻天他们逼向了绝路。张国焘已撕破了三个月前两河口会议上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面具,赤裸裸地要取而代之了。张国焘口发狂言,依靠的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四万人,难怪张国焘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7月中旬,张国焘



Xiang Pi

已经让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为我们留下了张闻天同毛泽东讨论如何满足张国焘在组织上提出要求的写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然而，毛泽东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以及这颗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

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并没讨论张国焘的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要林彪放弃到陕南打游击的观点，并要林彪到中央呆一个时期。表面上，在毛泽东等人的眼里，改变一个高级将领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张国焘另立中央还要重要。又过了三十二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绝党，自绝中国革命，但却只是电令张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并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并没给张国焘什么处分。“俄界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重视：“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张国焘犯了弥天大错而能暂时逃脱党纪的严惩呢？只能是尚在他手中控制着的红四方面军的几万人。

实力再一次显示出了它在政治和经济的搏杀中毋庸置疑的权威。

为了增加实力，党纪对张国焘网开一面；为了增加实力，取得信誉，红一方面军决定进行成败可能参半的跨河东征；为了东征后尚有退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去与张学良谈判。

只是在这个时候，在陕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1936年2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发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还出现有这样的字样：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卖国贼者，蒋介石先生也。蒋介石这一段演说尚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人的耳边回响：“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吗？北中国已差不多全部沦丧了！这不是卖国的老调又是什么？他们没有人会想到政治解决的绣球会由蒋先生本人抛出来，因为长征途中的血腥气还没散尽呢！因为每天都有红军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长眠不醒。

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十分希望政治解决，在行动上却更积极地和国民党前线将领发生联系。

2

1936年元月上旬，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他未及洗去征尘，立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见上一面。

两方反目为仇已近十年了，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要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少政治家，终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选择中度过，一旦选择完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计划。在常态的



Hong Pi

政治运转程序中，他们翻来覆去的偏执的政治主张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种新鲜的和声，但一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历史交响的主旋律，血流成河、一片瓦砾的悲剧就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也借助这悲剧在历史人物志的大书里取得一席较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过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促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只知道江水已暖的鸭子，最早叫出了春的声音。秋天里，他组织撰写了《八一宣言》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脱胎变骨，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公开刊登在共产国际办的杂志上。王明以他的绝顶聪明和超常的敏感，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关系合作史的首页上留下了他不容随便省略的大名。

然而，他却拒绝了邓文仪。是叶公好龙？还是因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这种犹豫？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在他以后的步履中，只要没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机会主义的味道。

邓文仪是领了圣旨前来找共产党的，自然不会浅尝辄止。大约在元月9日前后，他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胡秋原也就具备了当红娘的资格——了解双方的底细。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以潘汉年出面谈。这是谈判的规格问题，不再表明王明的个性。王明是领袖级别的人物，邓文仪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来，岂不是显得共产党太急不可耐了吗？见面时间定在元月13日晚，地点在“红娘”胡秋原家里。

按照约定的时间，后来成为国共和谈共产党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趁潘汉年脱外套取帽子解围巾的空挡，邓文仪仔细打量了这个对手：很年轻，相貌英俊，有一双招风大耳，两眼双眉的略略不对称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味道。太嫩了一点，邓文仪这么想着，心里略略存了轻视之意。且慢！那薄薄的双唇抿在一起了，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已有几缕嘲讽泄出，邓文仪不由得坐直

了身子，他在想，谈判不就是靠的一张嘴吗？

潘汉年刚一落座，随即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此前，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又想去四川或陕北直接和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接洽，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我这次来，可以代替蒋先生和你们谈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得更直接了：“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答道：“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可以说，联合抗日的原则已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你我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潘汉年步步紧逼：“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没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几天后，王明在见邓文仪时，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形式，坚持共产党仍坚持着的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

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蒋介石更不会接受这种平等，受孕的时机尚未到来。元月23日，邓文仪拿着一张王明和潘汉年为他出具的介绍信回国复命，他被告知：你可带此信直接入苏区与中共中央协商具体办法。

史料表明，这次秘密接触在双方都是一种不知所终的结局。从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中，看不见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表示任何兴趣。双方仍在兵戈相见，兵不厌诈呀！只能作这种解释。邓文仪以后在国共谈判的舞台上再没扮演过任何角色，像一颗流星一样，消



Xiang Bi

逝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无法辨清的一抹印痕。

如果不是一场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 1936 年元月对蒋介石发出的和解信号的反应，肯定要热烈得多。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 月中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的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谁知天意难违，董健吾抵西安后，陕西境内普降大雪，道路中断，他被困西安达四十余天。

2 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和肩负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不期而遇。张子华受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

说起谌小岑，这里必须补叙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另一条线索发生的事情。

1935 年 12 月底，蒋介石的亲信、CC 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 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 年元月，周小舟、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谌小岑再找张子华入陕，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动因：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

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为了不辱使命，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被迫进行内战，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